

# 农业雇佣关系中的一些特殊形式

## ——兼论 19 世纪英国农业的性质

杨晓敏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 针对学界关于英国 19 世纪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不同认识,本文提出,英国资本主义农业雇佣关系呈现了非常复杂的一面:“轮转制”“帮伙制”以及雇佣劳动中的一些“灰色地带”,使得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并非仅用“较多”使用、“不使用”和“较少”使用雇佣劳动这样的标准可以区分。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性质,并不因为是土地的习惯保有还是自由保有而发生改变。

**关键词:** 农场;雇工;“轮转制”;“帮伙”

**作者简介:** 杨晓敏(1963—),女,黑龙江肇州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和英国史研究。

**基金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2014B0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K5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5)05-0184-07 **收稿日期:** 2015-04-19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理论既适用于工业,也适用于农业。<sup>[1]352</sup> 资本主义农业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的农业资本家为前提。<sup>[2]722</sup> 有鉴于英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一般认为 19 世纪的英国农业社会,已经是一个由大租佃农场主——即前述的农业资本家主宰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随着对英国农业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大生产在农村的发展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充分。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衡量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雇佣劳动力的使用在生产中不占主导地位:“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定义资本主义的方法,把雇佣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部分,那么,到 19 世纪末英国农业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工业资本主义不相似。英国农业部类中有 50% 以上的非资本主义结构成分。”<sup>[3][4]377</sup> 前述论者进一步指出:在农奴

制和封建主义瓦解之后,英国土地经济形态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sup>[4]364</sup> 封建的土地法律和封建领主制的残存,以及与领主制密切相关的租佃制——“即使是最纯粹的租佃关系,也从来就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sup>[4]366</sup>,而且租佃制也有它的黑暗面,“租佃制是不能怎样促进经济的进步”(考茨基语),“与其说租佃农场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还不如说它与一种特定的经济部类即农业部类相联系”<sup>[4]372</sup>,“近代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结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超过 50% 的比例),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国民经济中农业部类的结构和性质这样一个一般性的重大问题。”<sup>[4]377</sup> 论者认为只有“后封建主义”适足以形容近代以来英国农业的性质。“英国农业生产关系在近代长时期里保持了一种后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结构。”<sup>[3]1516]</sup>

本文认为,前述学者对农业雇佣关系的研究中,有一些特殊的雇佣形式被忽视,从而简化了近代以来英国农业生产和雇佣劳动的复杂性;在笼统地谈论农业“租佃制”时,又对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契约租佃缺乏分别,这一切也许多少会影响到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因此,笔者不揣鄙陋,举出英国农业雇佣关系中一些特殊类型质诸关于资本主义农业性质的不同认识,同时对残存至现代的土地习惯保有形式、即所谓的封建制残余的经济制度略加剖析,使之有利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研究。

### 一、“轮转制”

经过了旷日持久的“圈地运动”(议会圈地)和地产权高度集中的发展,“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完全建立起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结构,并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地主—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的农业结构”<sup>[7]</sup>119-120。在这种农业结构中,另有研究者指出:“使用较多的雇佣劳动的农场属于资本主义农场。而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农场则属于非资本主义农场及家庭农场。还有一些农场使用极少的雇佣劳动,可视为半资本主义农场。”<sup>[3]</sup>笔者认为,此语境下的“使用雇佣劳动”是一种常态下的雇佣,即常年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农场和完全不使用雇佣工人、以及极少使用工人的所谓“家庭农场”和“半资本主义农场”。但是,雇佣劳动的使用并不总是循着常态进行,还有一些非常态、属于英国特有的雇佣劳动,其一为“轮转制”(roundsman system)。

众所周知,英国在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期间,曾制造了大量失地、破产的穷人。对于这些穷人,英国采取了一种制度性保障,这就是“济贫法”(the poor law)的实施。在英国典型的农业地区——英格兰东南部诸郡,济贫法采取的主要形式是“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sup>[8]</sup>23。在院外救济中,以“轮转制”对那些季节性失业的工人进行救济。这种救济方式,学者们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能找到例子,六七十年代则在很多地方盛行。在1782年之前,院外救济未得到法律认可,但根据1782年的“吉尔伯特法”(Gilbert's Act),法律认可了院外救济。<sup>[8]</sup>24哈蒙德说,济贫法就像是救济制度一样,它也是雇佣制度。1722年之前的济贫法全都是救济穷人的法律,但1722年的济贫法

被称作“定居、雇佣和济贫”的法律。<sup>[9]</sup>124 1782年的“吉尔伯特法”规定教区具体实施:监督员不能把身体健康的穷人送去济贫院,而是为他们找工作或维持他们的生活直到他们找到工作。监督员支付工资和规定工人生活标准。于是,在此基础上就成长出各式各样的公共雇佣制度:直接雇佣穷人为教区工作,缴纳劳工税的制度,或者在纳税人中间分享穷人的份额——也即“轮转制”,由此劳动力被卖给农场主。<sup>[9]</sup>124

何谓“轮转制”,哈蒙德引用伊登的话做了解释:在莱斯特郡,“在冬天或其他时间失业的人,向监督员提出申请,后者就打发他一家一家去受雇,雇佣他的主人,有义务给他饮食费用,一天是6便士,教区再添加4便士(一天10便士),用于养活他的家庭,以这种方式工作的人称为‘轮转工’(rounds-man),为的是他们在村里或城里转着圈地受雇”。这种轮转工有时从教区得到的不止4便士,而是6便士,或9便士。在伯克郡的温斯洛(Winslow),这种制度发展得很充分,大部分雇工都是这种轮转工,在冬天轮转的工人有40人,他们完全由教区支付工资,除非户主选择去雇佣他们。从这些情形看,工人经常变得很懒和专横。10岁大的孩子,也参与其中,一周从教区得到1先令6便士——3先令。<sup>[9]</sup>140-141

关于这个制度施行的细节和变种,另有学者论述说:在此制度下,季节性的失业工人,在减少工资比率的条件下被推荐给农场主,同时,教区制定不同的劳工收入和生活费水准。有些教区要求所有用工的农场去雇佣一定份额的失业者,失业者在农场主之间轮转。另有些教区完全采用自愿的制度,失业者被迫转着圈地找工作,但农场主可以拒绝雇佣他们。那些未得到工作的人从教区得到一些日常收入,稍低于受雇成功的人。

近代以来,英国一种特殊的遗产继承制度、“严格定序授产”(the strict settlement)制发展起来,这是由不动产律师和法官为了贵族和乡绅世代保有广大土地这一愿望而在地产权安排上进行操作的一套精密的法律体系。详见拙文《雪莱——“严格定序授产”制下的个案研究》,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2期。

在1834年前,“济贫院”(workhouses)救济的对象是老、病、幼儿和寡妇。很少有农业劳动工人被迫进入济贫院,因为院内救济比院外救济开支大。

伊登(Eden, Sir Frederic Morton, 1766—180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学生,著有《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

例如前者每天10便士,后者每天12便士(1先令)。这种制度的确切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在某些教区,雇主自主支付给这个轮转工的工资,另有一些教区按照工资比率来支付,还有的教区以拍卖的形式打发这些轮转工。<sup>[8]16-17</sup>在轮转制下,我们不确知农场主是不是对劳工的帮助更大,但是这个制度让劳工在本来失业的情形下,从用工农场主那里得到一份收入。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引起了那些未曾失业的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因为“一个农场主不会支付一周10先令的工资、在他靠‘轮转制’以用一半的数目就可以招聘来工人的话”<sup>[8]17</sup>。那些此前在冬天未曾得到救济的工人,这样一来也就处在“轮转制”下了。

在轮转制下,农场主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因为他知道最低生活标准和他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差额,教区会以济贫税补齐。由此可以看出,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主,实际上占了所有纳税人的便宜。无论用工、不用工的纳税人,都为农场主的工资支付买了单。院外救济在农业地区之通行,即使在1834年“新济贫法”颁布之后的一些年里仍然得到维护和坚持。<sup>[10]1435</sup>这样一种雇佣制度的建立,我们是难以判断各农场的用工情况的。而且“使用较多的雇佣工人的农场属于资本主义农场”这一说法也成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大农场一般比小农场节省劳动力,<sup>[11]117</sup>一个农人在300英亩土地上使用同一数量的工人,像10个农人每人经营30英亩土地时使用的一样多,<sup>[11]123</sup>不见得小农场一定用工就少。

## 二、“帮伙制”

在19世纪英国农业雇佣劳动力的使用上,妇女、儿童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851—1891年间,妇女在农业雇工中的比率占到25%。<sup>[12]50</sup>在1871年的统计中,有些地区,像达勒姆、德比、韦斯特木兰、坎伯兰、康沃尔等,这个比率是41%~38%。<sup>[12]57</sup>同样,直到19世纪晚期,学龄儿童也被用于满足农业劳动的季节性需要。一年四季生产中那些必不可少的工作:剪枝割草、采豆子、摘水果,架结“啤酒花”和采摘啤酒花,赶鸟、捡拾马铃薯和其他庄稼等农活,都由孩子们担任。

学者指出,19世纪60年代,一种最恶劣的有关妇女、儿童的雇佣制度在东英吉利亚的沼泽地区和米德兰东部牢固地建立起来。这些地方的农场一般规模很大,但是劳动人口分散和供应不足,

因为有很多“非开放教区”(closed parish),茅舍都被地主推倒以避免济贫税,他们的佃农就只好去“开放教区”(open parish)寻找存身之所。因此,田间劳动力就必然自远而来,这些人经常被组织在游动的“帮伙”(Gang)里,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去完成一些专项工作。例如,在林肯郡的山地,土地粗劣,需要很多人手去清理荆豆、蓟草、石块,帮伙中的妇女和孩子就被用来做这项工作,雇佣她们比男人便宜。此外,农场里的零活:锄地、为谷物和块根作物除草、撒肥、排水、修整树篱,也都是由帮伙来承担。直到20世纪初,英格兰东南部的很多郡一直用帮伙来满足农场对劳动力的季节性需要。<sup>[10]844</sup>

有些帮伙成员是爱尔兰人,整个夏收期间,全家都加入进来;不过,更多的人都是来自其工作所在地的附近村庄,这些队伍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字,一般规模在10~40人之间,平均年龄在20岁上下,男男女女,还有孩子,小的只有6岁,可能是跟着哥哥姐姐一同而来。这些人由帮伙头领掌管,出面和农场主协商具体工作。1867年的童工调查委员会关于“农业帮伙”的报告,对帮伙头领们的评价很坏:他们大部分都是找不到其他工作的人,没有农场主愿意全年使用他们,他们就是些赶工的劳动力,一些懒散的、醉醺醺的男人……某些时候,还干些声名狼藉的勾当。<sup>[13]99</sup>

孩子们拜帮伙头领所赐,干得又苦又累。伯罗夫人(Mrs. Burrows)19世纪50年代在沼泽地区的克洛兰(Croyland)长大,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在这样的帮伙里呆过。她至死都不能忘记童年时在帮伙中工作的经历,那个帮伙纠集了40~50个5岁到8岁的孩子,每天从6点出发,在田里干上14个小时的活,背后还有人拿着鞭子驱赶他们。<sup>[13]99-100</sup>

在这种典型的帮伙之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这种帮伙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佃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sup>[14]</sup>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使他的劳动人员大大

“开放”教区,也称“开放村庄”,英国19世纪一种乡村类型,与“非开放”教区(村庄)相对。前者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产主的教区,后者是指一个或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教区。开放教区对新居民采取开放的态度,建筑投机家也就在这种教区建造小屋和旅店,这类教区一般缺乏规划,建筑丑陋,落后拥挤。



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而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的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sup>[14] 801-802</sup>。1867年的《帮派法》(Gangs Act)和1870—1876年一系列《教育法》的颁布,使得帮派制得到控制。帮伙的头领要领取执照,而且不能雇用8岁以下的孩子,<sup>[15] 380</sup>雇用儿童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但是,帮派制持续存在,只不过对儿童的剥削变成了对妇女、成年男劳力的剥削,以此来满足各地农场对季节性劳动力需求。在沼泽、高原、牧场、石楠丛生的山地,在翻地、除草、收割都无法使用机械的地方,没有外部大量劳动力的帮助,不可能有什么收获。朗斯代尔伯爵(Earl Lonsdale)的地产上一个方圆600英亩的农场,定期雇佣8个男工和2个农场女仆,但是农忙时,需要60位妇女和20~30个孩子在田里干活。<sup>[12] 359</sup>1902年,一份来自剑桥郡威肯(Wicken)的记述说,在威肯及附近地区,大量的田间工作由妇女来做:锄地和清除杂草——她们喜欢用焚烧和冲刷的方法,工资是一天一先令多一点。<sup>[13] 118</sup>

总之,对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季节性需要和不定期地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现实,也使我们很难说农场、特别是那些中小型农场的雇佣关系发展是否充分。

### 三、劳动力雇佣的“灰色地带”

19世纪,农业雇工这一群体,随着社会生活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呈现总体萎缩和下降趋势,这可以从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看出来。不过,人口普查所得出的结论,有很多众所周知的局限:作为一种成熟的社会分析工具,普查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另外,“普遍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和政府紧缩经费的政策都对统计数据的汇编造成负面影响”<sup>[16] 174</sup>。这些局限在对农业雇工的普查中均有所体现,例如季节工、临时工、户外女工和童工在普查中的缺失。

19世纪人口普查的局限还在于,其所订立的类别逐时而变,缺少连续性。1851年的人口普查,农场主、牧场主的妻子为一个类别,而这个类别在1871年的普查中消失;1851年,农业劳动力有户内、户外之分,1871年,这个分别消失;1851年,农场主的女儿、孙女、姐妹和侄女等一类女亲戚,在1891年不再出现;1851年,农场仆人单独分类,在1891年的普查中,其与农场劳工

合并在一起;1891年新增一个养马人、马夫、赶畜群者(teamster)、车夫类别;在1901年的普查中,此前单独分类的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等统归于农场主亲戚一类,新出现的工头或领班,与农场经理人(bailiffs)合在一起。<sup>[10] 359-869</sup>这其中,农场主的妻子和其他亲戚、农场的仆佣以及季节工、临时工等都处于灰色地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因而雇工群体的量化人数不能不大打折扣。

19世纪的雇工形势显得复杂多变和因地而异,不仅妇女、儿童参与其中,还有雇工并非无地,雇工也可能是雇主的情形。一个斯塔福德郡的农场雇工回忆,他在19世纪80、90年代租了12英亩的农场由他妻子料理,他自己为别的农场主工作和在教区的采石场碎石。<sup>[12] 325</sup>在杭廷顿的圣尼茨(St. Neots)地区,那些大农场的雇工,自己也有2~10英亩的商品果园;汉普郡、贝辛斯托克附近的林地小农,起初从公有地上分得二、三亩地,生计就是一边种地,一边打零工,例如冬天在林子里找点零活,夏收时,为别的农场主打打干草、做做短工。<sup>[12] 326</sup>在肯特郡的布里恩(Blean)地区,一个小农的儿子回忆了他父亲既受雇于别的果园、又自己做雇主的情形,平时园子里活少时他给别人干活,待自己的果园收获时就需到外面雇佣些女工来帮忙,而且家人还要做些别的副业,显然做雇工的工资不足以维持生活。<sup>[12] 326</sup>此外,一些农业雇工在农村手工业和零售贸易等方面经常进行角色转换,而这些人在人口普查中也是容易被低估的一群。譬如,米德兰南部和西部以及湖区一带的林木工,这些人负责砍伐、加工并将其制作成——燃料、鞣料、农具、木桶、箍筒、篮筐、包装箱等。他们是伐木工、小商人、烧炭工、编筐人和桶匠,这样的人,在19世纪的人口普查中总数有30 000~40 000人,这些行当中,大部分工作都是季节性的,因此,从业者在普查中被低估。柯林斯指出,仅肯特一郡,林木工就超过1 000人,而在人口普查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体现,这些人中,很多就记录在农业雇工、雇工或农场主的名目下。<sup>[17] 484-501</sup>

### 四、19世纪英国农业“非资本主义”结构成分发展

综上所述,19世纪英国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关系,呈现了一个复杂的局面。由于农业生产的季

节性特点,有些农场主为了减少劳动力成本,在农闲时节,就减少对雇工的使用。但是18、19世纪济贫法中“院外救济”采取的“轮转制”,则保证了一个较为发达的自由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在就业机会很不充分的19世纪20、30年代,这些由教区救济的雇工保证了农场主的用工需求。此外,“帮伙制”的长期存在,以及农场用工中的那些“灰色地带”,也都说明了农场对于雇佣劳动力的潜在需求。实际上,在收获季节使用雇佣劳动必不能免,所以一个农场,一时不用工,并不意味着时时不用工,农闲时不用工并不意味着农忙时不用工,并且由于工人因其排挤就业而对机器产生的抵触,整个19世纪,英国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始终都不高。如此看来,即使“雇佣关系没有成为农业关系的全部形式”,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主要形式,直到19世纪末,农村中这些潜在的雇佣资源被工业社会吸收为止。因此,那种笼统地认为19世纪雇佣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的结构成分”不足50%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19世纪英国农业性质抱持新论者,还再三指出残存至英国现代的封建保有制残余,也成为非资本主义的结构成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需要发展和辩证地看。固然,习惯保有地产权一直存在到20世纪,但总的说来,这些地产权保有近代以来一直处于一种衰落和改变的状态下,而在19世纪,土地租赁关系则一直朝着有利于佃户的方向发展。以习惯保有中的“公簿持有”(copyhold)为例,这种保有准确称谓是“依领主的意志和按庄园的习惯”保有土地,此种地产权利人(其内部还需进行区分,且庄园习惯因地而异)。在持续的圈地运动中,产权的性质常发生诸多改变,如可继承的公簿持有地产变为三代保有的公簿持有地产或租赁持有的地产,从而它们所负担的封建义务也都相应发生改变。克里基说,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最普遍的变化是,前述地产权在继承或转让时应缴纳的“任意而合理”的入地费(entry fine),已被小额而固定的“罚金”(fine)取代。<sup>[18] 54</sup> 长期租约每隔一段时间要更新,在更新之时,也要缴纳“认可费”(recognition money),除了这笔昂贵的费用外,他们的租金都极为低廉。租赁地产权人中有一种契约租赁者,通常是租期短而租金高,没有入地费;所缴纳的“盘剥地租”(rack rent)根据物价、收成和土壤状况而定。这种租赁在圈地之后的农场中兴起。前

述的那些世代保有土地的公簿持有农和租期为三代或99年的习惯租地农都可能将自己的土地租给这样的契约租地者。圈地运动常常是地主收回土地和改变租约的机会。在17世纪晚期,特别是18世纪,地主们为了追求地租利益最大化,当公簿持有农或习惯租地农的租期终止时,地主们经常收回土地,将其合并成大块,租给任意租期的佃农以收取盘剥地租。<sup>[19] 97</sup> 那些坚持到近代的公簿持有农,自19世纪40年代起,通过议会颁布的一系列“公簿持有法”(Copyhold Act)得到解放。19世纪那些有改革思想的不动产委员会成员认为,公簿持有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它束缚经济增长,像那些在伐木和采矿事项上,领主必须要与公簿持有人协商的习惯,在缴纳继承金和死亡贡物方面挑起的侵犯和欺骗等,都是法律和地方习惯脱节的地方。1852年、1858年和1887年的“公簿持有法”让领主有义务解放公簿持有人,而那些还没有改变的保有关系,根据1922年的《财产法》被强制解除。在反法战争之时,战时和战后剧烈的价格变动,打击了人们对长期租约的信心。当小麦价格急剧上涨时,佃农获利而地主的租金却因此前签署的长期租约之规定不能更改;而当战后粮价下跌、复遇经济萧条之际,长期租约的佃农又发现自己的租金固定在物价昂贵之时,因而无力支付,地主不得已要么同意减缓、要么干脆放弃租约。结果,除了像牛津、剑桥这样的法人团体和一些教产的租赁外,一般的地主和佃户都放弃了长期租约而代之以租金可以实际兑现的逐年租约。长期租约的缩短,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土地改良缺乏保障,为了能使逐年期租约的佃户安心对土地进行投入和改良,不使其过度利用土地,英格兰利用“佃户权”(tenant-right)和基于“佃户权”而出台的一系列《农业租地法》(Agricultural Holding Act),对佃户于土地的投入进行补偿。<sup>[20] 138-141</sup> 这就使那种认为“租佃制”不

地产权(estate),是普通法特有的概念,起初只是为土地而设计,现在也应用于各种基金。该概念指的是一种抽象的利益存在,其所有权可依时间维度予以分割。但其整体可代表当下现实存在的土地。又,《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第15卷,“财产”词条:“所有权并不附着于土地,而附着于一个抽象的实体:地产权。地产权居于土地占有和土地之间,纯粹是概念性的,但法律把它当作似乎是真实的东西。”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民法》,第70页。

从1793年3月起,英国公开组织起全欧洲七次反法同盟,卷入了长达22年的反法战争。

怎样利于农业进步的泛泛之论失去根据,同时,那种认为封建的土地保有制一成不变地沿袭至现代的见解也是靠不住的。

封建保有制的另一面,从领主的角度看,两个世纪以来土地法律的发展,特别是“严格定序授产”制(the strict settlement)的确立,让19世纪英格兰的土地产权高度集中。在这种继承制度下土地很少能够分散。根据“新末日审判书”,除去占地1英亩以下所有者的耕地,余者四分之一为1200人、平均占地16200亩者所有;另四分之一为6200人、平均占地3150亩者所有;再四分之一为50770人、平均占地380亩者所有,最后四分之一为261830人、平均占地70亩者所有。联合王国五分之四的土地,掌握在不到7000人手中,其中360人在英格兰拥有的地产超过10000英亩。<sup>[21]44</sup>这种集中的地产正成为大型租佃农场建立和存在的基础。大土地经营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除了前面提及的节省物资和劳动力外,在机器的使用上,在大型灌溉和排水工程的建筑、使用和维护上,在信用和商业领域以及合理而科学的管理上,都有着小经营无可比拟的优势。<sup>[11]116-132</sup>在19世纪末,直到严格定序授产制下的终身地产权人有权处置他占有的地产时,英格兰才开始出现大规模地产转让,而差不多同时也开始了大型租佃农场的衰落,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清晰的联系。

19世纪70年代以后,乡村人口,主要是雇工大规模迁徙、移民,对大型租佃农场的衰落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1841—1911年,农村地区损失450万人口。据估计,19世纪下半叶,每10年,农村各郡失去10%的人口,他们有些去城市,有些去海外。东南部诸郡移民首选伦敦,这些地方每百万人中,三分之一在19世纪下半叶的某些年里,曾生活在伦敦。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以1年10万人的速度向海外移民。从1860—1900年,有420万人口离开,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sup>[12]86</sup>

农村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得以实现,端赖铁路建设的发展。铁路不仅是农村雇工藉以离开的途径,铁路建设本身就为这些雇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大约10万工人在20年里修建了1万英里的铁路,而铁路雇员从1851年的65000人增长到30年后的175000人。<sup>[15]102</sup>铁路事业也刺激了其他行业

的发展,例如煤矿、制砖、采石和石灰生产,这些行业都给迁徙者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研究者指出,19世纪对于英格兰、威尔士农村的那些迁徙者而言,国内最具吸引力的五个地方,两处是煤田,一个是东北部从提兹塞德(Teeside)到泰因赛德(Tyneside)之间,包括约克郡的北雷丁、达勒姆、诺森伯兰地区,再就是格拉摩根和南威尔士煤田。<sup>[22]46</sup>农村雇工的迁徙,还得到了“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鼓励和帮助。这个组织是农业雇工在政治上的代表。1881年,联合会主席约瑟夫·阿奇(Joseph Arch)对皇家农业委员会说,大约有70万男女和儿童被他们组织前往新世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那些农业迅速发展而急需劳动力的地区。<sup>[20]104</sup>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劳工人数是1233800,在1891年缩减为780700人。在1851—189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加了近一半,而这期间它的农村居民却下降了三分之一多,与之相对的是1891年的城市地区总人口大约25000000人,而农村地区人口仅为7500000,占城区总数的23%。哈格德在《乡村英格兰》中极为贴切地指出:1830年那个血脉贲张的人口怪物,在1902年只剩下一副摇摇晃晃、出离的骨架。<sup>[23]565-566</sup>

劳动力减员的影响,加上延续了将近一代人的“农业大萧条”(1879—1896),让种植地区的生产和经营遭受了沉重打击,大型租佃农场从此走上没落之途:缺乏人手而劳动力价格上涨,农场无法出租或由耕地变牧场,由此可以减少劳动力使用,或者用机器代替人工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大型租佃农场遭遇的这种历史命运,而否认它曾经主宰过英格兰农业的事实,也不能看不到社会现实的发展给那些所谓的“非资本主义”结构成分带来的影响和发展,从而否定英国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

“新末日审判书”(New Domesday Book),指的是1875年出版的《土地所有者报告》(The return of owners of land)。1861年人口普查显示,拥有土地的人只有3万,而不过150个人拥有英格兰耕地的一半。这成为土地垄断和所有权不平等的证据,受到改革派的攻击。为此,1873年2月,德比伯爵呼吁上院批准政府动用公权进行调查,他说,难道真相是得不到的吗?现在搞一次土地赋役调查会比诺曼征服时代更难么?此即《新末日审判书》编号的由来——1086年,征服者威廉下令进行土地赋役调查,调查结果被称为《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



## 参考文献

- [1]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郭大力,王亚楠,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 [3]沈汉.资本主义还是后封建主义:论近代英国租佃农场制的性质[J].史学集刊,2011,(1).
- [4]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 [5]沈汉.近代英国农业的结构和性质问题:兼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J].史学理论研究,2007,(1).
- [6]于民.圈地运动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典型性问题新论:兼与国内某些流行性观点商榷[J].安徽史学,2009,(2).
- [7]文礼朋.近现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衰:农业与农民现代化的再探讨[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 [8]Boyer G 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ish Poor Law 1750—185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9]Hammond J L, Hammond B. The Village Labourer 1760—1832: A Study in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before the Reform Bill( new edition ) [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0.
- [10]Colins E J T.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M].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2000.
- [11]考茨基.土地问题[M].梁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 [12]Reay B. Rural Englands: Labouring Liv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13]Samuel R. Village Life and Labour[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5.
-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5]Mingay G E. Rural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M]. Stroud: Alan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Phoenix Mill· Far Trupe Stroud Gloucestershire, 1990.
- [16]Harvie C, Matthew H C G. 19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M].韩敏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 [17]Mingay G E.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M].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989.
- [18]Kerridge 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After[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9.
- [19]Allan R C. Enclosure and Yeoma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Midlands 1450—1850[M]. Oxford: Oxford Press, 1992.
- [20]Orwin C S. A History of England Farming[M].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49.
- [21]Caird J. The Landed Interest and the Supply of Food[M].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878.
- [22]Saville J. Rural Depopul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1851—1951[M]. London: Routledge, 1957.
- [23]Haggard H R. Rural England: Being an Account of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Researches Carried Out in the Years 1901&1902, vol. [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6.

[责任编辑:秋 语]